

科学把握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

□ 刘伟

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

新年伊始,回望过去,眺望未来。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,实现了“六稳”,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。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,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。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,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,比较而言,供求两端“双收缩”的可能性大大提高,自然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,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,我们要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,强化其结构性效应,提质增效,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,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,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。

保持持续健康增长

当前,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,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。一方面,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;另一方面,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。2019年,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,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转变宏观调控方式,完善宏观经济政策,推进“六稳”工作,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增长;同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,有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,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。总体而言,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。

就宏观经济增长主要指标看,我们预计,全年GDP增速处于预期区间,有望达到6.2%左右,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;2019年中国GDP总量有望接近100万亿元,占2019年全球GDP比重16%以上;人均GDP水平将超过1万美元,达到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;CPI涨幅全年平均预计在3%左右,虽然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冲击,但总体保持在预期政策目标水平上;调查失业率预计5.2%左右,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5.5%以下的要求。2019年前三季度,我国贸易正增长,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%左右,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.2%,进口负增长0.1%,贸易顺差扩大,相比同期全球贸易增速的大幅回落,中国稳外贸成效显著;外商直接投资保持正增长,

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6.5%,尽管一些低端产业从中国搬迁到东南亚等地,但外资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规模扩大;在外贸,外资增长平稳的基础上,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,外汇储备开始回升;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,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.8%,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6.1%,与GDP增长基本同步;经济结构转变取得明显进展,高技术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增长6.3%和4.6%,高于工业总体盈利水平;“三大攻坚战”取得关键性进展,特别是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,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。

总之,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增大、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,仍然保持了持续健康增长势头,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值,“六稳”的要求全面落实,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的情况下,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势,为全面实现“十三五”规划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下行压力不减

尽管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均在政策目标区域之内,但动态地看,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,2019年按季度看,增速是持续下降的。总体上全年同比增长预计为6.2%,虽然与全球相比增速领先,但与上年同期相比,有所回落,表明总体上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。从我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变化周期特点看,自2009年第一季度名义GDP增速反弹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,到2015年第三季度达到底部,2015年底触底反弹至2017年第一季度达到顶点,尔后又开始持续回落。按这种3至4年下行周期测算,我们认为,2018年至2019年是经济下行的加速期,2020年至2021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触底反弹期。

从需求端来看,一是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叠加带来了明显的紧缩效应;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态势明显;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滑、增速放缓;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,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,金融周期底部运行

特点明显;五是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前三季度实际同比增长仅为6.4%,有所回落;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,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,国际贸易增速回落,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,增速下降,中美贸易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。

从供给端来看,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,基数红利逐渐降低。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性高速增长,伴随基数的扩张会逐渐减弱。特别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,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期,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,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,人均GDP突破1.1万国际元后都出现了速度的放缓。目前,我国经济增长进入“换挡期”,“三期叠加”影响持续深化。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。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三产业快速提升,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,工业制造业企业利润紧缩,企业内生动力不足,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,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整体较弱;由于受创新能力提升迟缓及不确定性限制,新动能转换相对不快,升级性的结构调整步伐放缓,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、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速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下滑;并且由于各类对新动能产业支持政策的到期,政策红利减弱,一些成长中的新兴产业和企业面临严峻挑战,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传导效应逐渐显现,对高技术产业新动能转换产生实质性的冲击。因此,经济结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影响。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,使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化红利加速下滑。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,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率的持续下滑,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递减期,中国人口峰值事实上已经或即将出现,2018年新生儿减少200万,老年人口则大幅增长。五是要素成本红利开始全面减少,尤其是土地、能源、环境等资源约束更为严格,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既无可能更无竞争优势。

判断自然走势

总体上看,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,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,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,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,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,因此经济稳中向好、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。但同时面临国内“三期叠加”,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性、体制性、周期性矛盾交错,全球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,全球化受阻,不确定性加剧。因此从2020年经济增长看,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,2020年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“双紧缩”态势。需要根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较,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,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

就总供给而言,扩张性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:一是发展性因素的改善,包括技术进步、对外投资增加、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。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对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作用,包括全要素生产率(TFP)增速回升;持续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,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,企业市场活力上升,产业结构呈现良性变化;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2217个改革方案,仅2019年便出台285个改革方案,完成46个重点改革任务,基本完成61个改革任务,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加凸显;营商环境明显改善,创新指数大幅提高。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,在关键科技、科技研发、重要设备等领域的战略政策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,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计算机、机械设备、生物产业、新材料等领域已见成效,净利润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%以上的高水平。但总体上看,如前所述总供给方面的不利因素更显著,总供给呈现收缩状态。

就总需求而言,积极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:一是部分领域投资需求的增加,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,国有企业投资上升,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改善。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去库存、去杠杆周期后,在本轮逆周期调节中开始“后发”,投资能力回升,同时对民营企业具有带动作用。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,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,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深化,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

充实,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等收入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,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突破40万亿元大关,其基础便在于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。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2020年带来全球政策红利。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,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,与2019年年初相比,全球各国央行大都下调了政策性利率水平,全球经济恶化状况有望得以缓解。但是综合前述总需求方面的不利因素,2020年总需求大概率收缩。

综合研判有利和不利因素,在总供给、总需求“双收缩”的条件下,2020年,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,自然走势(不包含政策作用)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%,相应的CPI的自然走势较2019年也会有所下降,可能降至2%以下。

坚持稳中求进

基于上述判断,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。

“稳”首先是稳增长,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。根据经济增长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,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,防止出现高通胀。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,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防止“经济过热”。二要在经济增长上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,防止经济衰退。三要与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,保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。因此2020年稳增长,GDP增速应在5.5%至6%之间为宜。通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势。

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长。在需求管理上,笔者认为,总体应采取扩张性政策。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必须继续坚持,同时强调提质增效,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。此外,还要加大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;必须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,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,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,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,完善结构性减税,重点扶持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发展;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,财政支出项目重点进一步向民生项目倾斜。

调研之页

务实提升金砖机制“含金量”

□ 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赴福建厦门调研组

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,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局、面向未来发出的引领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重要倡议。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倡议,厦门市近期启动建设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”,打造金砖务实合作旗舰项目,通过深化合作、创新模式,全面提升金砖机制的“含金量”。

总的来看,深化金砖机制是我们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要求。从纵向看,金砖机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。金砖国家之间加强全方位深度交流、增强价值认同和利益共识、深化各层次务实合作,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。从横向看,金砖机制是我国深耕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强化南南合作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。金砖机制不断完善,在重大问题上共同发声,大大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,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迈出坚实步伐。从未来展望看,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是我国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。

具体到厦门而言,建设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”,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深远的战略意义。一是政策优势。厦门是经济特区,并相继承担了自由贸易试验区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国家改革试点任务,整合现有分散的各种合作机制和制度安排,有利于种好金砖合作的制度“试验田”。二是产业优势。

厦门拥有平板显示、计算机与通讯设备、机械装备、旅游会展、现代物流、软件和信息化服务、金融服务、文化创意等8条千亿产业链群,形成了光电、软件、生物与新医药等国家级产业基地,这些产业优势契合金砖其他国家的诉求,有望形成高质量、可持续的工业化生产服务能力。三是区位优势。厦门是我国重要的海陆枢纽城市,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和大型口岸机场,已开通国际航线30余条。这些优势便于要素汇聚,促进贸易和投资活动。四是人文优势。厦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,人文资源底蕴深厚。

当然,厦门在建设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”方面,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,需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,形成与金砖国家全方位合作相适应的发展态势。

在自由贸易、互联互通方面:可依托厦门已有的供应链龙头企业,建立面向金砖国家的跨境电商和贸易公共服务平台,解决信息不对称、服务不到位问题,促进贸易额快速提升。厦门航空公司是厦门的独特优势。应大力加强厦航实力,提升其行业定位,开通金砖国家直飞航线,将厦门机场打造成为“海上丝路航空枢纽”,并更好地辐射其他市场。

在金融支撑、产业投资方面:探索在厦门建设金砖国家综合金融示范中心,筹建金砖产业投资基金,为重点项目落户厦门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。探索汇率稳定新机制,推进外资管理制度开放创新,为金砖国家提供一站式服务,争取将厦门金砖创新基地

打造成面向金砖国家的产能融合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、人才交流中心、国际结算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。

在动能转换方面:厦门可在相关部门指导下,升级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,构建金砖国家产业创新合作网络,打造金砖合作产学研要素资源汇聚区、高端产业示范区、国际创客中心、工业互联网应用中心等。

在民心相通、创新机制方面:在国际关系中,民心是深连接。应在厦门发起相应项目,深化金砖国家各方面交流,培养合作人才,促进民心相通。可推动厦门与更多金砖国家重点城市结为友好城市,让伙伴关系的理念扎根人民心中。

目前,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与厦门市达成共识,共建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”。在推进创新基地建设过程中,将充分考虑金砖各国的特殊国情与共同诉求,探索一条新型合作发展路径,推动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更紧密、更全面、更牢固。

总之,站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,厦门通过建设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”,将成为深度参与国际关系博弈的一个新型城市主体。这样的新型主体,对于我国完善全方位外布局、推动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,都将是有益的创造尝试。

(成员:赵亮 刘云 郭成林 徐娜娜 刘艳梅 朱小良 杨斌 董振华 叶蓁蓁 执笔:董振华 叶蓁蓁)

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。同时还借助互联网、大数据等科技手段,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上下功夫。

总的来看,正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,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,使天津市北辰区的社会治理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,并推动实现了从等问题到找问题、从各自为政到联合作战、从压事压责到赋权赋能、从集中整治到常态长效的转变。北辰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,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具体实践,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积累了一些经验,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。

一是必须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,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力、组织力、号召力。党建引领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成效,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。一方面,要牢牢抓住市县这个基层治理的主战场,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、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、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结合起来,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、协同性。另一方面,要在加强基层党建上下功夫,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,强化政治领导、思想领导、组织领导,为深入推进基层治理发挥更大作用。

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把为城乡群众搞好服务、多办实事、破解难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新时代,人民群众对有效社会治理和良好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,就是把良好社会秩序作为人民群众的幸福之基、和谐之本,畅通和规范群众利益协调机制,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,着力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,确保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。

三是必须在作风建设上狠下功夫,用心担当作为,敢抓敢管敢“碰硬”。基层治理涉及范围广,工作任务繁重,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发扬新时代斗争精神,主动担当作为,敢于动真碰硬,着力解决涉及城市管理、环境整治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,以更高的标准推动

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

基层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。四是必须注重广泛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,形成多管齐下、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。从天津市北辰区的实践来看,广大群众中蕴含着参与社会治理的巨大热情和力量。加强社会治理必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,坚持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,不断完善政策措施,丰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渠道,为基层治理注入多元力量,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、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。

(成员:高卫兵 冯卫华 何江川 柏连阳 陈昌盛 任永强 执笔:陈昌盛 冯卫华)

本版编辑 欧阳洸